

論 黃 河 河 源 問 題

黃 盛 璋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科學通報”1954年10月號發表傅樂煥先生“關於黃河河源問題”一文，作者對董在華先生的“黃河河源初步研究”(“科學通報”1953年7月號)中的結論，提出懷疑，另一方面也提出一種很可能的推測。1952年董在華先生等的黃河河源查勘，收穫甚多；但由於事前準備不夠，事後很多圖籍又未盡參考，以致在歷史地理方面很多地方不能令人滿意。去年春作者因為要解決清代四川西北省界跟黃河流經四川的問題，就曾發覺這次查勘中的兩個重要發現，在研究分析上都還有一些問題。關於札陵、鄂陵兩湖的問題，將另文討論，這裏只就河源問題把年來所見到的材料跟研究結果寫出來供大家討論。

一．清代黃河探源源道考實

根據1952年黃河河源勘查結果，星宿海上頭有兩條主要河流：一支較偏西北叫“約古宗列渠”，一支來自西南叫“喀喇渠”。這次發現“約古宗列渠”是黃河的正確源頭，可是這裏並沒有“噶達素齊老山”，而“約古宗列渠”西邊的“雅合拉達合澤山”很多情形都跟“噶達素齊老山”不一樣，絕不是一個山。在另一方面，乾隆47年(1782)，派阿彌達所探的河源“阿爾坦河”情形却跟“喀喇渠”一致，因此董在華先生認為“清代探河源的結果，在源頭的部位名稱上，和這一次查勘結果都有很大出入”¹⁾。清代探查的河源就是來自西南的“喀喇渠”，而這次查勘的“約古宗列渠”才是黃河真正源頭。

傅樂煥先生的“關於黃河河源問題”主要在說明這次勘查的黃河正源“約古宗列渠”在清康熙末年就已找到。水道提綱裏的河源“阿爾坦河”很可能就是這一條，可是它跟阿彌達所探河源的“阿爾坦河”却不是一條河。他的證據和推論主要有兩點：

- (1) 阿彌達報告裏的河源“阿爾坦河”許多情形都跟水道提綱裏的河源不一樣；
(i) 水道提綱記載星宿海上頭有三條河，河源“阿爾坦河”是中間的一條，阿彌達的報

1) “黃河河源初步研究”。科學通報，1953年9月號，頁18。

告也說這裏有三條河，北面跟中間的河水色綠，只有南面一條色黃，他就沿着南面色黃那條河上尋而肯定它是河源的，位置跟水道提綱所記不一樣；(ii) 阿彌達報告裏的河源“阿爾坦河”在流入星宿海的途中有伏流的情形，而水道提綱沒有；(iii) 水道提綱裏的河源“阿爾坦河”从北面有“西拉薩山水”、“七根池水”等支流加入，這跟“約古宗列渠”北面有“約古直哈拉各之古山”水匯入，情形大致相符合，而“喀喇渠”北面是“左謨山”，是一片高地，沒有顯著的支流匯入。

(2) 清末民初有些地圖(舉例二種，詳下)上把這段黃河寫成“馬楚河”，有的並在“馬楚河”的源頭寫明“黃河源”，他肯定當時人民已經知道黃河的正源。

傅先生第二個證據跟推論都是錯的。清代輿圖，夙所究心，據我看過的百多種清代地圖中，黃河上源，清末諸圖大抵繪有三條。至於“黃河源”的部位那就只有兩類：一類注在最北面的一條，這就是傅先生所舉的1909年“清帝國全圖”，全無根據；另一類是注在中間一條，這一類大抵出於光緒末年鄒代鈞所繪諸圖，例如1907年皇朝直省圖裏“黃河源”是注在中間一條，並注有“馬楚河”，傅先生所舉的1914年新亞洲輿地學社的“衛藏附青海新圖”就是出自鄒圖。鄒氏沒到過河源區，他主要根據1907年以前的西人所繪的西藏地圖跟路線圖，“喀喇渠”因入藏所經，西人確有到過的，至於“約古宗列渠”，在1907年前西人就無人到過。鄒氏何從知道黃河源出“約古宗列渠”呢？此外，傅先生又以爲清末民初的地圖上河源部分出現“馬楚河”，“這條馬楚河肯定地就是“約古宗列渠”。必須知道，藏族地區把大積石山以南的黃河全部叫做“馬楚”，“馬楚”(rma-chu)藏語意即黃河，在黃河上源部分注明“馬楚河”，不能由此推証它或它的源頭就是“約古宗列渠”。馬楚河的上源可以有三條。傅先生舉的1909年的“大清帝國全圖”倒是把這段上源註爲“馬楚河”，“黃河源”就緊接在這個馬楚河的上頭，但它却寫在三條上源最北的一支，這倒反而成爲反面的証據了。

傅先生主要証據是第一個，這裏頭(i)、(ii)兩點(一個部位在南，一個在中間；一個沿途有伏流，一個沒有)都只能証明兩條“阿爾坦河”不是一條河，水道提綱的“阿爾坦河”不是南面的“喀喇渠”，但並不能証明它就是現在的“約古宗列渠”。水道提綱說這裏有三條河，河源“阿爾坦河”是中間的一條。據這次勘查，這裏主要有兩條河，水道提綱的河源不是南面那條是肯定的，可是我們怎能証明它就是來自西北的“約古宗列渠”呢？倘論位置，它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傅先生的第三點，水道提綱的“阿爾坦河”从北面有“西拉薩山水”、“七根池水”等支流加入，跟現在“喀喇渠”情形不符合，而跟“約古宗列渠”情形相像，這也能証明水道提綱的“阿爾坦河”不是“喀喇渠”，要是拿它

來證明它就是現在的“約古宗列渠”，這也是很不充分的。

傅先生的証據雖不怎麼充分，同時他也只說水道提綱所記“這條‘阿爾坦河’很可能就是‘約古宗列渠’”¹⁾，並沒有把他們的結論說得怎麼肯定，但他的推測却是正確的。水道提綱裏黃河源是“阿爾坦河”，阿彌達的報告也說河源名“阿爾坦河”，水道提綱河源有“噶達素齊老”，阿彌達的報告裏也同樣有，而且情形幾乎差不多。過去的人沒有人懷疑過它們是不同的兩條河，傅先生能根據水道提綱發現兩個“阿爾坦河”並不是一條，並進而推斷說水道提綱的河源很可能就是現在的“約古宗列渠”，我覺得這都是傅先生讀書心細的地方。

清代探河源究竟有沒有到過“約古宗列渠”而發現它是真正的黃河源呢？我們的答案也是肯定的。康熙末年就已找到黃河正源的“約古宗列渠”，那是一點也沒有問題的，我們的証據是實際勘測的材料。最近這次黃河河源勘查工作事先準備是非常不夠，關於黃河上源地區歷史地理以及從前有關勘測黃河上源的資料，事先大都沒有參考。自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年，許多帝國主義分子偷竊地在河源一帶進行勘查，徐近之先生的“黃河最上游”跟徐爾灝的“青康藏新西人考察史略”已提到不少，這些資料他們也好像都沒有看。德人台飛（Albert Tafel）曾經於1907年到了黃河正源，並測有“黃河源區圖”。據徐近之“黃河最上游”的撮述，台飛所到過的黃河正源的情形是：

“地當廣數公里向河谷中，……谷中又有無數出口水潭散佈，其中最大的湖狀盆地，流出一極狹小溪，寬只一步，惟深及一公尺。河源之準確地位，經定為北緯35°6'36"，東經96°4'。由河源極端渾圓山形區內之孤獨石灰岩處以望，黃河上游，蒙名為索羅馬（Soloma）者，蜿蜒流行而東，又號“阿爾坦郭勒”（Altan Gol）。源東五十餘公里內，北岸有三大支流自西南來會。同距離內由西南來會諸水皆小，原野向東開展，其間砂岩小邱與山脊時，為數無窮，有類填滿之大湖然。又東約四十公里許，有楚爾莫扎陵水（Tsulmo Tsaring）由西南流注，會口以下二、三公里，即星宿海鄂博（Obo-Odontala—4,310公尺），同時北岸亦有大水來會，由此至札陵湖二十公里餘間始無支流”²⁾。

拿它來跟這次黃河河源勘查報告比較：

“黃河發源於‘雅合拉達合澤’山東南約30公里的‘約古宗列盆地’……的‘約古宗列灘’，……灘上草地之外有砂地和大小的小塘，在1平方公里以上的小塘不在少數。灘中心有一個小塘，名叫‘宗列拉木錯’，……‘約古宗列灘’外圍的水都在這裏匯集，形成一條蛇形的河道，寬約10餘公尺，深約1公尺，黃河正源就在這裏。……‘約古宗列灘’出灘後，向東進入長約18公里的山谷，南會‘左模雅朗’，出山谷後，蜿蜒於極大的灘上，藏民叫‘馬湧’。‘馬湧’上黃河向東屈曲進行。左岸匯來了‘直合拉個渠’、‘更營渠’、‘康列將各渠’等，右岸匯來的除‘左模

1) “關於黃河河源的問題”，科學通報，1954年10月号，頁89。

2) 據余近之“黃河最上游”（地理學報第十五卷二、三、四合期，1948年，12月，頁35—36。）引述，據徐氏自註，係據 Albert Tafel: Meine Tebetteise 和 Gunther Kohler: Der Hwangho, Fine physiographie.

雅朗’和‘左謨馬朗’外,更有喀喇渠¹⁾。

可見情形全相符合。台飛記谷中無數沒有出口的小潭就是董文裏的“大小的小塘”,台飛記黃河初出谷的“寬只一步,深約一公尺”的極狹小溪,就是董文裏“寬約10餘公尺,深約1公尺”的黃河正源的蜿蜒河道。情形尤其相符合的是:台飛記北岸三大支流,也就是董文的“直合拉個渠”、“更營渠”、“康列將各渠”。至於由西南來會諸水皆小,台飛沒有記,董文記出是:“左模雅朗”跟“左模馬朗”。台飛說:又東約四十公里許有“楚爾莫扎陵水”由西南流注,它就是這次勘查的“喀喇渠”,“喀喇渠”的北面是“左謨山”,“楚爾莫”跟“左謨”都是“tsolmo”的譯音,“楚爾莫”現在還可以找到着落。我們看看他所測的“黃河源區圖”,再看看董文附的“黃河源形勢略圖”,只要一比較,就立刻



圖 1 1962 年勘察的黃河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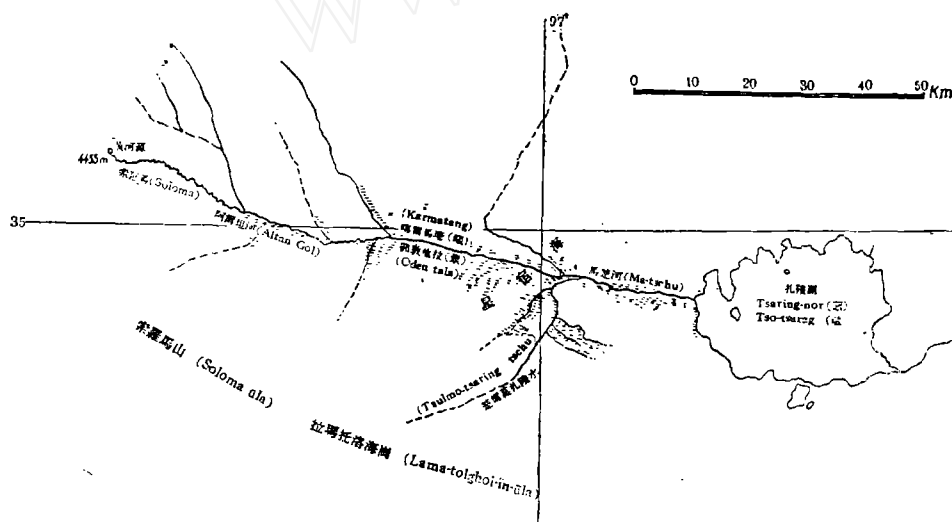


圖 2 台飛實測的“黃河源區圖”

1) “黃河源初步研究”, 科学通報, 1953年9月号, 頁16—17。

知道他所測的黃河真源不成問題就是這次勘查的“約古宗列渠”了¹⁾。

其實台飛的河源勘查並沒有什麼新東西，它主要就是水道提綱裏記載的材料，水道提綱說這裏有南、中、北三支河，河源“阿爾坦河”是中間的一支，台飛也說“阿爾坦郭勒在星宿海區內，河道極度彎曲，成編織狀，主要為三條水道，皆相當寬廣，深度皆在一公尺以上”²⁾。自西南來會的即“左模扎陵渠”，至於北岸來會大水他沒有記其名字，河源“阿爾坦郭勒”正是從中間流出那一支，這不成問題就是水道提綱的河源“阿爾坦河”。水道提綱說三條河來匯為一道，土人名此三河曰“古爾班索爾馬”，“古爾班(Gorban)”蒙語為“三”，意思是三條“索爾馬”，“索爾馬”就是台飛“Soloma”的譯言。台飛說這條黃河正源，蒙名“Altan Gol” (“Gol”是蒙語“河”的意思)，又叫“Soloma”，名稱也完全一樣。此外水道提綱記河源北岸有“噶達素齊老峯，高四丈，亭亭獨立”，據徐近之先生說：“河源巨石蒙名阿勒坦噶達素者，台飛河源中照片有之”³⁾。由此可見，台飛所謂黃河真源，實際上就是水道提綱所記康熙末年探查的河源“阿爾坦河”，這只要一对照台飛實測的圖跟皇輿全覽圖中的河源部分就可以看得出來。台飛狂妄，自以為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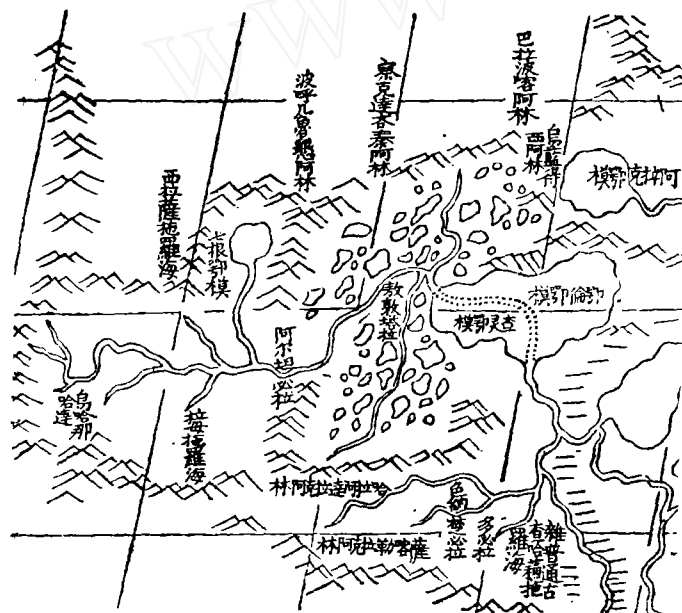


圖3 皇輿全覽圖中的“河源圖”河源部分(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木刻本)

- 1) 台飛由河源西南行，經拉宅凍山口，下“色爾可渠”(Serkoh chu)，遂入長江上游。這次河源勘查也曾從河源到通天河上游，經過“色爾可渠”，當即“Serkoh chu”的譯音，由其路線也可考察他所到過的河源跟這次勘查的河源“約古宗列渠”部位是一致的。
- 2) “黃河最上游”，見地理學報第十五卷第二、三、四合期，頁36。
- 3) 同上，頁32。

有他探得黃河真源,其實早在他一百九十年以前我國就把黃河正確源頭探測出來了。

台飛的河源既然就是水道提綱裏的“阿爾坦河”,根據他的“黃河源區圖”跟他的報告,又不成問題就是這次勘查的“約古宗列渠”,那麼這次勘查的黃河正源“約古宗列渠”也就是水道提綱裏的河源“阿爾坦河”,這一點是可以完全肯定下來。

水道提綱記河源巨石名“噶達素齊老”,台飛也曾看到,“約古宗列渠”既然就是“阿爾坦河”,那就應該可以找到。可是根據項立志、董在華合寫的“黃河源區調查記”說:他們“過了鄂陵湖就開始注意這座名山,一直從通天河繞過黃河源頭——約古宗列渠——,經過黃河南岸各支流西岸,並沒有一個山叫噶達素齊老山”¹⁾。這好像是個疑問,其實這也不成問題。水道提綱只說“噶達素齊老”是一個高四丈的獨立的巨石,並不是什麼高山,此石原在河源的北面並不當河源的盡頭。據董先生報告“(約古宗列)灘北面的山名‘約古直哈拉各之古’,高出灘面 120 公尺,在各山頂突出的灰白色岩石露頭,高十餘公尺,²⁾‘高十餘公尺’正合四丈之數,同時它又在河源的北面,位置也恰相合,要是河源附近實在找不到‘河源巨石’,那應該就是這一位。河源勘查隊受了傳統說法的影響,心目中老存着‘噶達素齊老’是一座很高很大的‘名山’,那當然就是看見也找不到了。

其次再談“喀喇渠”問題。根據“湟中雜記”載阿彌達探河源回來的奏議,他於“四月初三日到鄂敦他拉即星宿海東界,……初六日望祭瑪慶山,查看鄂敦他拉共有三溪流,自北面及中間流出者水係綠色,從西南流出者係黃色。即沿溪行走四十餘里,水道伏流入地,隨其痕跡又行二十餘里,復見黃流湧出,又行三十餘里到噶達素齊老地方,乃通藏大路”³⁾,他所探測的黃河源就在這裏。董先生根據實際勘查證明阿彌達的探河源就是現在“喀喇渠”,“色黃”、“伏流”及當入藏大路等跡象,跟這次勘查所見是完全相同的,董文提到“喀喇渠水顏色赭黃”,提到“水已斷流……再下,水又復出現”,提到“入藏大路從巴顏和欠來者沿喀喇渠的左岸非常明顯”⁴⁾,這些跡象都無疑地說明“喀喇渠”跟阿彌達探的河源“阿爾坦河”情形完全一致。

“喀喇渠”就是阿彌達所探的河源“阿爾坦河”,也是跟上述的“約古宗列渠”同樣肯定。阿彌達說他所探河源“噶達素齊老地方,乃通藏之大路”,自西寧進藏大路係康熙五十九年清兵進藏所開,以後沒有多大變改,從清代許多記西寧入藏程站記錄中找

1) 人民日報,1953年,1月21日第二版。

2) “黃河源初步研究”。科學通報,1953年,9月號,頁17。

3) 玉簡齋叢書本,頁10—11,“查看河源情形”條。

4) “黃河源初步研究”。科學通報,1953年7月號,頁17。

出了“噶達素齊老”地方,也找到“喀喇渠”另一寫法“哈拉河”,現在先把主要幾種材料有關部分依西寧入藏的站次列一對應表,然後再加說明(表1中數字表里距)。

表 1

(1) 西寧新志(卷二十一,1761)	(2) 西藏考(乾隆初年) (衛藏通志同)	(3) 西招圖考 (1798)
省力麻(黃河源).....	鎖里麻(即黃河沿,此一帶即黃河源)	
60 噶順阿更兒		
60 且克腦兒	90 且克腦兒(即星宿海)	噶爾瑪湯
70 哈麻胡六太	40 哈麻胡六太	
70 哈拉河(北即星宿海)	40 哈拉阿	噶達素赤老(黃河源 見此一帶)
50 烏蘭伏哩(北,星宿海)		
60 阿拉台奇(北,星宿海)	60 道塞勒河	
60 喇嘛托洛海(北,星宿海)	80 喇嘛托洛海川口	喇嘛托隆谷
50 一克白彥哈喇	50 白彥哈拉	噶達 巴彥哈喇

清代十多種記西寧入藏程站,都是自這幾種輾轉抄錄的。這幾種在站名上雖彼此略有出入,但總的路線沒有兩樣。表中(1),(2)兩種都在阿彌達探河以前,第三種係駐藏大臣松筠記其嘉慶初年由拉薩返北京出西寧之路,已在阿彌達探河源之後,“噶爾瑪湯”即藏語“星宿海”,見水道提綱跟台飛的報告;“喇嘛托隆谷”即銅版乾隆十三排圖上的“拉瑪托羅海”,在阿爾坦河的河邊,當着入藏通路;“巴彥哈喇”即黃河源的“巴顏喀喇山”邊一個地名。我們在台飛的“黃河源區圖”上還可以看出沿着“tsulmo ts-aring chu”(“即喀喇渠”)的流路有“Soloma ūla”跟“Lama tolghoi-in-ūla”,“Lama-tolghoi,”就是“喇嘛托隆谷”或“喇嘛托洛海”的對音,“Soloma ūla”的西南就是“巴顏喀喇”(Bajan chara)。松筠所經的“噶達素齊老”在星宿海之西,“喇嘛托隆谷”之東,他說“黃河源見此一帶”,其地位不成問題是在喀喇渠沿岸,也就是阿彌達所探河源的地方。拿這個考證結果來對証表中一、二兩種程站,我們可以肯定“哈拉河”就是“喀喇渠”。名稱也跟現在完全一樣:由漢語對譯蒙語“k, g, h”的音,可以不別,“哈”、“喀”可以隨使用。“巴顏喀喇山”最早的記載即寫作“巴顏哈喇”,“渠”(chu)是藏語“河”的意思,“哈拉河”即“喀喇渠”,在對音上沒有問題。水道提綱記“阿爾坦河”三河會合,“南有哈喇答爾罕山北流之水,來會為一道”,所指既係今“喀喇渠”,那麼“哈喇”兩字也還可以找出着落。除名稱以外,証據還有三個:(i)“哈拉河”在星宿海之西,喇嘛托洛海之東,其地位只能是“喀喇渠”;(ii)拿表中(1),(2)兩種的“哈拉河”跟松筠路程對照,正好就是“黃河源見此一帶”的“噶達素齊老”的地位;阿彌達到達之地,明明就在這裏;(iii)“西寧新志”在“哈拉河”跟“喇嘛托洛海”的後面都註:“北即星宿海”,位

置既都在星宿海之南,而“喇嘛托洛海”又在“阿爾坦河”或“喀喇渠”河边,“哈拉河”除是“喀喇渠”以外,就再沒有別的可能。

二. 論兩條不同源道為什麼會同名“阿爾坦河”,誤被認為一河的

1954年三、四月間作者看到徐近之“黃河最上游”文中轉引台飛等對黃河源的敘述跟台飛實測的圖,知道水道提綱裏河源“阿爾坦河”就是現在的“約古宗列渠”,跟阿彌達所探的河源“阿爾坦河”不是一條,然而作者始終不明白為什麼兩條河都叫“阿爾坦河”,而且源头又都有“噶達素齊老峰”,如何能說不是一條?這問題應如何交代?解釋好像可以有兩種:一是齊台南弄錯了方位,二是阿彌達有意附會。齊氏雖未親到河源,但他在乾隆一統志卷四一二青海“黃河”條,說出他河源材料的根據主要有三:一是閻若璩的書經地理今釋,二是青海山川冊說,三是輿圖,前兩種今已不傳。他所參考的輿圖也待考証,但他有根據是不成問題。當時一統志館確是收藏不少有關地理方面的“秘圖”、“秘檔”,齊氏治學素稱謹嚴,水道提綱敘述河源又是明晰非常,我們有什麼根據能說他記載錯誤呢?阿彌達雖較齊氏稍後,但他到過“喀喇渠”已屬肯定,弘曆把他這次探源當做很大一件事來宣揚,要是當時這條河不叫“阿爾坦河”,他正好據實把真名報上,其發現豈不更大,弘曆豈不更為歡喜,再也用不着跟齊台南爭“阿爾坦河”發現先後,硬說齊氏是“加以臆測”了。其次,他奏報所探河源係當入藏大路,後來入藏程站也証實確是經過這裏,既當通路,往來就多,難保沒人發現,要是一旦被發覺其偽造,他的頭就難保住,這玩笑是開不得的。一則減少自己的功績,再則又冒生命的危險,他沒有任何理由要隱蒙真名來附會“阿爾坦河”。

傅先生並沒有弄明白這個問題,他以為或者弘曆受了阿彌達的欺騙蒙蔽,後來的人也都受了他的愚弄,毛病好像是出在阿彌達,但他為什麼要如此惡作劇,欺騙弘曆,愚弄後人?他所探的河源為什麼河名跟峰名全跟水道提綱一樣?依然是個不解之謎。年來稍事涉獵歷史地理上的入藏道路,看過傅文,才決意要弄清楚問題真象,作者把近年搜集的十多種入藏程站的記錄細檢一過,結果在“西藏考”、“衛藏通志”、“衛藏圖識”、“西藏圖考”等書裏發現由松潘出黃勝關進藏程站,最後一站是“古爾班索羅木”。“衛藏圖識”跟“西藏圖考”在這個“古爾班索羅木”下註:“即黃河,合西寧進藏之路”。“西藏考”跟“衛藏通志”註說:由“此交西寧進藏大路苦苦賽”,¹⁾這使我恍然大悟其中

1) 詳西藏考頁42(叢書集成本)。衛藏通志卷4程站,西藏圖考卷4諸路程站附考,衛藏圖識卷3。“古爾班索羅木”各書譯名不一致,例如西藏考作“骨路半所利屬”,西藏圖考作“古爾分索羅木”,實皆一地。

道理，多少年來沒人能明白的疑團，我覺得現在可以全部解決。

原來阿彌達所探的河源，確名“阿爾坦河”，又叫“索羅木”，“索羅木”就是黃河，是蒙族叫黃河上源一段河的名稱。1901年俄人科茲洛夫的實測圖裏就記舊札陵湖以西的黃河為“Солома”，括弧內註“Верхняя Хуань Хэ”，意即“黃河上游”¹⁾。索羅木上源有三條，所以叫做三索羅木，水道提綱明明說：“三河來匯為一道，土人名此三河曰古爾班索爾馬”，可見這三條河都可以叫做“索羅木”的。中間的一條即水道提綱的河源，已經台飛實地證明蒙名“索羅木”，又叫“阿爾坦郭勒”，南面那條“喀喇渠”即阿彌達的河源也不成問題叫做“索羅木”，上述的由松潘進藏的“古爾班索羅木”，就是指這一條，證據有兩點：(1)西寧入藏既然走南面“喀喇渠”，松潘在星宿海的東南，由此合西寧進藏大道，一定是指走這裏；(2)苦苦賽在哈拉河之西，木魯烏蘇河之東，入藏程站中都有記載，由此合苦苦賽，指的只能是“喀喇渠”。拿中間那條“索羅木”也可叫“阿爾坦河”來類推，南面的索羅木當然也可叫“阿爾坦河”²⁾。

明白了南面的“喀喇渠”也是叫做“阿爾坦河”，那麼清代黃河探源問題才可全部弄清楚。阿彌達把這條“阿爾坦河”當做唯一的黃河正源報了上去，這確是他的大錯誤，可是連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所發現的居然跟水道提綱的“阿爾坦河”全不是一回事。他看到星宿海西有三條河，只有南面那條色黃，當然就沿着色黃的走，走到河源附近，“詢之蒙番等，其水名阿爾坦郭勒，此即真河源也”。既然就是真河源，名稱又跟過去記載完全一樣，就更增加自信心，不可能懷疑他會摸錯了路，河源既經確定，所以就忽忽趕回去報告，其餘兩條就連看也不去看了。要是當時這條河不叫“阿爾坦河”，顯然他是不能如此匆忙，不再看看其他兩條就回去的。

其次談到“噶達素齊老”，湟中雜記引他的報告，只說：“……又行三十里至噶達素齊老地方，乃通藏之大路，西邊有山，山根有泉流出，其色黃”，把它說成“巨石”，“上有天池”的是乾隆四十七年的上諭：“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其崖壁黃赤色，壁上為天池。池中流泉噴涌洒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真黃河源也”³⁾。兩者之間顯然有些出入，我們以為湟中雜記所引情形較為

1)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Кам” (蒙古同西康), 頁352, 後附圖。

2) 銅版乾隆十三排圖上“拉瑪托羅海”在“阿爾坦河”河邊。據台飛的圖，沿著 tsulmo tsaring chu 流線方向有“Soloma ūla”，此渠傍邊有“Lama-tolghoi-in-ūla”“Lama-tolghoi”，就是“拉瑪托羅海”的譯音。“tsulmo tsaring chu”就是現在的“喀喇渠”，也就是十三排圖上的“阿爾坦河”，可証“喀喇渠”源是叫做“阿爾坦河”。但銅板乾隆十三排圖測繪年代，現還不能十分確定，未敢遽引為証，附誌於此，以待將來考証。

3) 河源記略卷首。

真實，既然他肯定他所走的黃色渠就是黃河真源，蒙藏居民又告訴他這就叫“阿爾坦河”，那當然就該有“噶達素齊老峰”，等到走到河的盡頭，西邊有山，山根有泉流出，他當然就以爲這就是“噶達素齊老峰”了。水道提綱明明說此峯在河源北面，而乾隆上諭則說在西邊當河源的頭；乾隆上諭還有個漏洞，據弘曆自己在“御製河源詩”後說：“詢之阿彌達，則稱：河源皆土山無石，無石安能有玉？”我們也可以同樣問：“河源土山無石，無石安能有高達數丈的巨石在河源西邊出現？”彼此顯然是有矛盾的。看來“河源皆土山無石”，“西邊有山，山根有泉流出”（並非出於天池）等情形是真實的，至於乾隆上諭的“噶達素齊老”的巨石以及天池之類，那就是出於附會。¹⁾

然而他這次探源，不但弘曆不清楚這個“阿爾坦河”跟水道提綱的“阿爾坦河”不是一回事，就連他自己恐怕至死也不會覺悟北面還有一條“阿爾坦河”，他是摸錯了路。要不是這次勘查，這個秘密恐怕就不會被人揭露，糊里糊塗讓它誤過去多少年。

這次查勘的河源雖然康熙年間就已到過，可是它仍然有新的學術意義：第一，它確定那一條河是黃河正源問題，雖然這個問題將來還可討論（詳後），但有了這次實測的基礎，問題確定就很容易的了；第二，通過這次實地查勘，我們才有可能証實阿彌達探的河源是“喀喇渠”，而水道提綱的河源却是“約古宗列渠”，兩者都叫做“阿爾坦河”，但是不是一條；第三，它還事實地駁斥了台飛自以爲黃河真源是他發現的無知謬論，台飛探的河源並沒有什麼新的東西，早在他一百九十年前我們就把這條黃河正源探測出來了。

三．論黃河應該有三條上源

根據董文，這次勘查是肯定“約古宗列渠”是黃河正源，至於“喀喇渠”就把它看成“約古宗列渠”的支流。後面的提法是很成問題的，黃河上源應該不止一條，“約古宗列渠”只是幾條上源中的一支。論証可分爲三點說明：

第一，河源的發現應該是居住於該區的居民，最初就該是羌族，第一次提出黃河“源出星宿”的是署名爲張華著的博物志，第一次看到河源是唐貞觀九年（635年）侯君集、李道宗等擊吐谷渾，舊唐書吐谷渾傳記李道宗說：“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既然古來沒有到過，何從知其近河源？這兩個知識都該是從吐谷渾人口中輾轉傳來。

1) 據現在所看到的有清一代輿圖中繪載“噶達素齊老”的最早一個圖是銅版十三排圖，此圖“噶達素齊老”注在星宿海的正西，不在南邊條“阿爾坦必拉”的源頭上，而且兩者位置相去很遠，這也可作乾隆上諭中的“噶達素齊老”名稱是出於附會的一個旁証。

自秦厲公時起，河源地區即為羌族盤據，達千餘年，永嘉之亂、鮮卑族的吐谷渾才入據青海，羌族從此為所役屬。南朝跟吐谷渾聘使頻繁，此時河西走廊的國際通路已改由西寧。“河出星宿”的知識大概就在這時第一次傳入中國，所以陶弘景才敢提出“禹迹所至，不及河源”的說法。羌民族最初發現的河源，今已不詳所指，但清代此區的居民所說的河源，那是清清楚楚地指出有三條。早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玄燁派拉錫、舒蘭往探河源，曾當面告諭：“黃河之源雖名古爾班索羅謨”，其發源之處，從來無人到過¹⁾，既沒人到過，何從知道這個蒙古名稱，可見最初這個知識也是從河源區的蒙族得來。“古爾班索羅謨”意思就是三條“索羅謨”，蒙族把黃河上源一直到鄂陵、札陵以東的黃河，都叫做“索羅謨”，可見他們認為黃河是有三條上源的。乾隆跟乾隆的臣下為要把阿彌達的探河源說成發現，就說拉錫、舒蘭等只到了星宿海，這又是不符事實，據舒蘭的報告，他們六月初七到鄂陵，初八到札陵，初九到星宿海，在星宿海西邊河源地區考察兩天，看到“流出三支河，即古爾班索羅謨也”²⁾，這裏就是河源所在。既然三條都是河源，就以為盡到責任，無須再為辨別，所以十一日就回程考察黃河繞大積石山的流路情形。水道提綱敘述這三條上源，也說“土人名此三河曰古爾班索爾馬”，蒙族居民認為“索羅木”上源有三條，那應該是肯定的。

第二，“喀喇渠”既然就是三條索羅謨中的一條索羅謨，那它就該是黃河一條上源，至少蒙族居民是把它看成一條黃河上源。阿彌達的報告裏明明說：“詢之蒙番等，名‘阿爾坦郭勒’，此即真河源也”，“真河源”這句話顯然也是當地蒙藏人民告訴他的。既經証實，所以他就毫不懷疑，不再往北面看去了。這更証明當時居民还把“喀喇渠”看成為黃河源。

第三，“喀喇渠”不但是一條黃河上源，而且它還是最早被發現的黃河源，清以前所發現的黃河源，大抵就是指這條當入藏通道的“喀喇渠”。第一次達到星宿海，看到河源的是在貞觀九年，侯君集、李道宗等追擊吐谷渾，從青海湖南，往牛心堆，赤水源，登漢哭山，戰烏海，踰積石山，次星宿海，又達柏海上，觀河源所書³⁾。舊唐書吐蕃傳又說：“贊普率其部兵至柏海，親迎於河源”，可見河源跟柏海都當着入藏通道。以後長慶二年（822年）劉元鼎使吐蕃還，路過河源，曾第一次作了河源考察的簡略報告，杜佑通典卷七四辨河源出於吐蕃，也說：“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可見唐代河源是當入藏大

1) 東華全錄卷74，康熙四十三年九月丁卯。

2) 舒蘭“河源記”，又東華全錄卷74，康熙四十三年九月丁卯。

3) 舊唐書吐蕃傳，新唐書吐蕃傳。

路。入藏通路是唐代第一次開闢，元鼎所經，大致是從西寧(鄯州)出日月山(赤嶺)，過黃河源，經木魯烏蘇河(犂牛河，即通天河)，自當拉嶺以入拉薩，這就是清代西寧入藏的道路¹⁾，基本上沒有多變改。唐代河源既然當着通路，那就應該是清阿彌達所探的河源，也就是“喀喇渠”了。清初人的入藏紀錄還說“黃河源見此一帶”，這情形可為唐河源的佐証。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都實往探河源，一般都說他只到星宿海，據朱思本所得的材料，說河源“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敦腦兒’”。“火敦”譯言就是“星宿”，可見河源尚在其西南百餘里，所指也該是來自西南那一支上源。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宗泐和尚使西藏還，有望河源詩，據其詩序，他所望的河源，也是當地藏民族告訴他的²⁾，仍然當着入藏通路，跟唐代沒有二致。至於“約古宗列渠”一向不當孔道，自西寧入藏沒有理由取向西南以後，又改向北，繞道從這裏走，這條河源我們認為到清康熙末年才發現的³⁾。

地理學上確定一河河源的問題，迄今還沒有完全一致的標準。有兩個問題是需要黃河河源勘察隊加以說明的：(1) 勘察諸報告對“約古宗列渠”的源頭情形有較詳細的說明，但對“喀喇渠”的源頭就沒有怎麼說，問題就無法比較。“約古宗列渠”是黃河正源可能沒有問題，但河源查勘隊怎樣確定一定是“約古宗列渠”，而不是“喀喇渠”，就需要列舉兩個河長度、源頭形勢、水量等事實，提出根據，以求得到徹底的解決。(2) 歷史記載都說這裏有南、中、北三條河流入星宿海，台飛的報告跟實測的圖証實這一點，而這次查勘這裏只有兩條河，要是“約古宗列渠”的上面(北面)還有一條河，那這次河源查勘就沒有完全盡到責任。

關於黃河河源問題的再補充

上文寫成於去年 11 月。半年多來又斷斷續續看到一些材料，但主要的收穫都在清初地圖測繪跟地圖材料及年代鑑定方面，其中也有些關係黃河源的，最重要的一點要算阿彌達所探河源阿爾坦河，即今“喀喇渠”，當時確叫“阿爾坦河”，找到了圖，也找到了文字記載的証據，上文推論現在是可以完全確定了的。清初地圖測繪牽涉的問題很多，詳細的闡述須另寫專文，這裏作者想只能把有關於黃河源的若干結論部分寫出來作為上文的一個補充。

1) 說詳拙著“歷史地理上的入藏通道”。

2) 詩見錢謙益“列朝詩集”，萬斯同“崑崙河源考”。陳潢“歷代河防統纂”，卷一曾引其詩序。

3) 李元星：“黃河正源知識的年代上限問題”(科學通報 1955 年 6 月號)說法是錯誤的，當另詳。

(1) 康熙四十三年(1704)派拉錫、舒蘭等往探黃河源，他們回來後有報告、有圖，圖到現在雖還沒有發現，但根據他們的材料繪製的黃河源圖那是存在的。1943年前輔仁大學複印的皇輿全覽圖中有兩張黃河源圖¹⁾，其中第16號的“河源圖”的河源部分就是他們探查的材料，福克司(Walter Fuchs)定此圖測繪年為1707—1711年，但他不知此圖的河源部分的測繪應在1704年，而且應該就是據拉錫等繪的圖加以補充擴大的。上文曾說明1704年拉錫等探河源，他們在星宿海以西考察了兩天，知道黃河有三條上源，叫做古爾班索爾馬，意即三條索爾馬河，三條索爾馬既都是黃河之源，因此這一次並沒有確定那一條是黃河正源，而籠統以為都是黃河源回報了上。在上述第16號的圖上河源附近的山川地名大抵同於拉錫等的報告，星宿海以西有三支較長的河流。在三支河中部注：“三河名孤爾班索爾馬”，“黃河源”也注在這裏，意思是三條索爾馬都是河源。南面那一支河，注有“阿爾坦河”字樣，這就是阿彌達所探的河源“阿爾坦河”的位置，此名不見於拉錫等的報告中，也許這一次就發現這條河的名稱。他們在河源區停留兩日，這裏既當入藏通道，他們當然首先就順着通道來考察河源。無論怎麼樣，這條阿爾坦河的名稱在1711年前就已發現，那是毫無疑問的。

(2) 1711 年康熙曾將在青海西藏測繪的地圖(大概也包括黃河上游第 16 号圖在內)交雷孝思(J. B. Régis)審閱,雷氏認為測繪不精確,跟內府地圖銜接不上,所以 1717 年康熙又派遣“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理藩院主事勝位等往繪西海、西藏輿圖,……使臣測量地形,踰河源,涉万里,如履階闥,一山一水,悉入圖誌”¹⁾,这次非常重视河源地形測量,当出於康熙的指示。約古宗列渠就是这一次的發現。第二年(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皇輿全覽圖”全部告成,此圖據今所知,大概有兩種:一种即瀋陽故宮所藏銅版,1929 年曾石印出版,題為“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一种係木刻,分省繪製,上述前輔仁大學福克司所複印的“皇輿全覽圖”就是这一种,現在科學院圖書館藏有該圖的原圖²⁾。第一种銅版中的黃河源部分跟第二种木版的“黃河源圖”(福克司編號第 9)情形是完全一樣的,圖中黃河源已經肯定為中間那一條“阿爾坦必拉”,就是水道提綱中的河源阿爾坦河。過去沒有人能清楚齊台南水道提綱究竟用的什麼圖,現在知道上述兩種圖他都用過。阮學濬為水道提綱作序,說“先生(齊台南)迺按內府輿圖,獨翊為之,其圖縱橫數丈,列之中廷地上,”這裏所指的是第一种銅版圖,可是黃河源部分乃用的第二种,這有兩個証據:(i) 水道提綱對黃河源敘述,跟第二种福克司編號 9 “黃河源圖”情形全合,譯名也都一樣;(ii) 乾隆一統志卷 412 青海那一部是出於齊氏專筆,其敘述黃河源文字都跟水道提綱一樣,而青海部前面附的圖就全是自上述 9 号圖翻印的。水道提綱中的黃河源依據的圖既經找出,那麼約古宗列渠就是康熙五十六年所發現的河源阿爾坦河就無須再辯論。

(3) 1931 年故宮博物院印行的銅版十三排圖,過去翁文灝先生曾因為黃河源部分有“阿爾坦河”字樣,而不肯定究竟在阿彌達探河源前或後。現在我們完全弄清楚此圖完成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1766 年乾隆即着手派人勘測,1769 年新疆全部為滿清所平定,第二年圖即全部告成,主持这次勘測的是何國宗,但對象為新疆部分,跟黃河上源無涉。此圖黃河源部分跟皇輿全覽圖有所不同,黃河星宿海以西最長的上源是阿爾坦河,但位置不在中部而在南部,入藏通道正是從這裏經過。然而這個阿爾坦河上頭並沒有注“黃河源”字樣,而且札陵、鄂陵兩湖更是繪得莫名其妙,一個湖註有兩個名字,這証明他們並沒有到過這個地區,不是經過實測得來的。圖上繪有入藏

- 1) 嘉慶重修一統志卷 546, 又卷 547:“(康熙)屢遣使臣,往窺河源,測量地度,繪入輿圖,凡河源左右,一山一水與黃河之形勢曲折,道里遠近靡不悉載”。可見康熙朝“往窺河源”不止一次,而 1717 年那一次測繪特別重視黃河源,為的是要繪入輿圖精確。
- 2) 收藏入館時誤被鑑定為“乾隆內府本地圖”,這是錯誤的。其中“河源圖”即福克司編號第 9 第,但沒有 16 号的“河源圖”。此外該館還藏有一本彩繪本地圖,其中的黃河圖即上述 16 号的“黃河圖”。

路線，站名很詳細，許多站名都見於清代的入藏程站，其中“拉瑪托洛海”一站正位於“阿爾坦河”的南邊，根據台飛實測的圖以及清代入藏程站，可以知道這個“阿爾坦河”就是現在的“喀喇渠”，也就是阿彌達所到過的河源“阿爾坦河”，這一點又是不成問題的。乾隆四十七年編“河源紀略”時參考的就是這個圖，叫做“欽定輿圖”，河源紀略中對於黃河源以及若干河流經緯度的計算都是跟此圖一致¹⁾；但他們不清楚水道提綱的阿爾坦河跟此圖及阿彌達所探的阿爾坦河實在不是一條，爲要把河源阿爾坦河發現之功上在乾隆的眼上，就誣賴齊氏也曾看見這個圖；看見圖上有“阿爾坦河”跟“喀達素齊老”，“遂沿襲舊訛，加以臆測……，使真源所在，轉湮沒不彰”²⁾。這真是極混淆是非之能事，須知水道提綱寫成在此圖印成之前，這個罪名是加不上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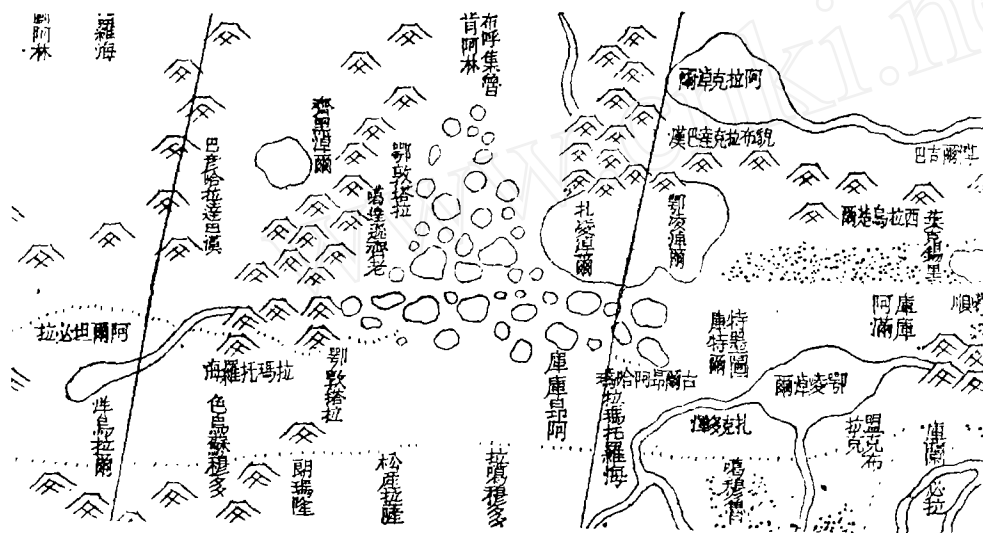


圖5 銅版乾隆十三排圖中的河源部分（據北京故宮博物院印行的“乾隆內府輿圖”）

(4) 清代肯定南邊這條阿爾坦河爲黃河源的也是在康熙末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兵由西寧入藏，自此闢爲通道。當時有一個修江人李彩著藏紀概³⁾，記載他康熙五十九年隨軍入藏的行程很詳細，是清代西寧入藏程站最早也是最詳細的一種，其行程自第四十墩之“前索羅木”，“黃河至此始成河”開始，一直到五十六墩“黃河祖源阿爾坦

1) 修河源紀略時參考的圖也不僅此一種。河源紀略卷12對黃河源的敘述，的確爲傅樂庵先生所懷疑，有東拼西湊、抄襲別處材料的嫌疑。河源紀略卷一“阿爾坦郭勒重源圖說”的圖也是東拼西湊，不大可信的東西，不過“齊黑淖爾”傅先生認爲是抄襲水道提綱中的“七根池”，這倒是誤猜。此圖上阿爾坦河之北，有“齊黑淖爾”，可以爲証。

2) 此書僅見傳寫之本，北京圖書館藏有一種，又吳丰培先生曾據所藏寫本油印散佈。茲所據即吳油印之本。

河”，都是沿黄河行走，都是記載黄河源區的情形，其中提到前索羅木跟後索羅木，又提到“黄河伏流”的情形，跟阿彌達所見相同。其第五十一墩是“黄河源後索羅木灘中苦苦阿滿□厄勒索木泉”（即哈嘛胡亦太），第五十二跟第五十三墩是星宿海，第五十四至五十六三墩都是“黄河祖源阿爾坦河”，第五十八墩是“巴顏哈喇”，跟以後的入藏程站情形一致，第五十六墩明明寫着“黄河祖源阿爾坦河边喇嘛托洛海岡”，跟銅版乾隆十三排圖的“阿爾坦河”情形完全一樣，這個“黄河祖源阿爾坦河”不成問題是南面那一支，即今“喀喇渠”的位置。从这一材料的發現，一方面解決阿彌達所探的河源阿爾坦河名問題，一方面也解決銅版十三排圖河源部材料的來源。自康熙五十九年以後由西寧經黄河上源，木魯烏苏入藏關為通道，“喀喇渠”正為通道所經，当地的蒙族人民也把它当做黄河一支源头，來往西藏的人当然对它特別熟悉，因此就都認為黄河源就在这裏。這個說法在当时一定很有勢力，所以对銅版乾隆十三排圖河源部分，寧願根據这些人帶回的材料，而不根據皇輿全覽圖。

(6) 十九世紀末年和二十世紀初年，英、法等帝國主義对西藏存着覬覦的野心，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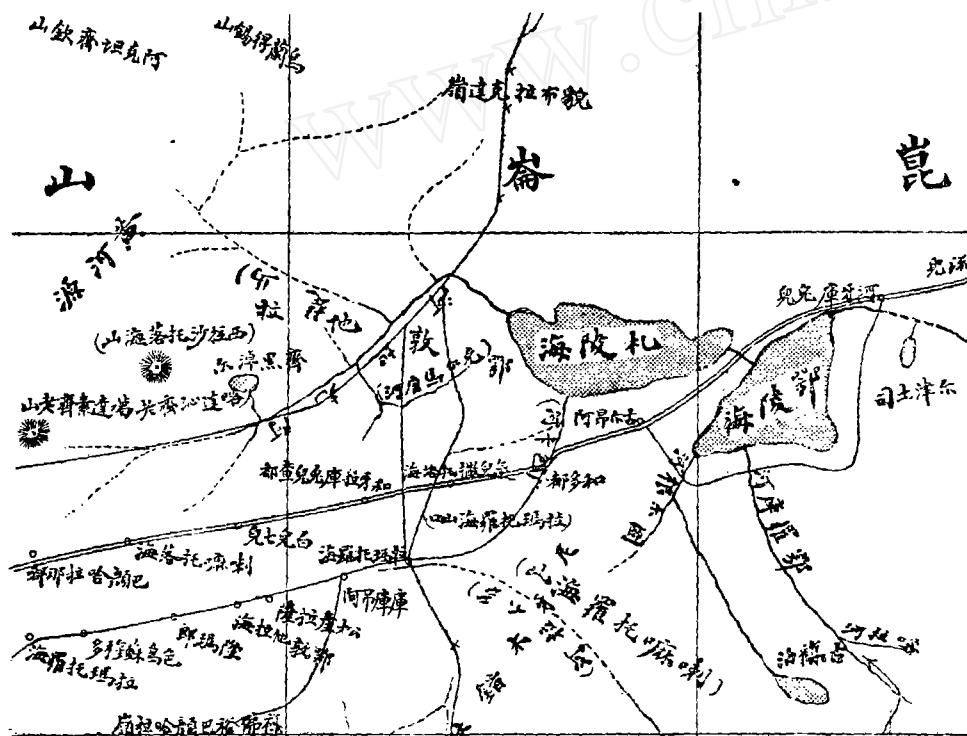


圖 6 胡維德譯 法人費脫勒依的“西藏全圖”中河源部分(據光緒三十年胡氏印本)

遣許多人在青海、西藏一帶偷行勘測，印行過不少種地圖，其中最詳細的一種為法人竇脫勒依的西藏全圖。光緒三十年(1904年)胡惟德曾將此圖轉譯為漢文，以後中國地圖關於青海、西藏部分，大多是根據此圖。這張圖黃河源部好多地方都抄襲中國測繪的材料，黃河上源的情形差不多跟1907年台飛所測完全相同。從這裏就可說明幾個問題：(i) 此圖星宿海以西黃河有三支上源，南支叫“阿爾坦河”，“馬楚河”注在中間一支，“黃河源”也就注在這裏，但中、北兩支他們根本沒有到，繪的是虛線，他們到過的是南支“阿爾坦河”，這裏繪有他們由此入藏的路線。中、北兩支根據的是清代測繪材料。然而拿此圖河源部跟台飛所測的“黃河源區圖”一對，就知道黃河三支上源分佈完全相同，台飛自以為只有他發現了黃河真源的無耻妄言，只能證明他的無知而已。(ii) 此圖入藏路線上的程站和銅版乾隆十三排圖大致相同，黃河南源阿爾坦河他們是到過的，在這個阿爾坦河的南邊有“喇嘛托落海山”，跟台飛的圖一致；又有“喇嘛托落海”站在“阿爾坦河”河邊，跟乾隆十三排圖一致，這一點可以說明這個“阿爾坦河”就是藏紀概的黃河祖源“阿爾坦河”跟乾隆十三排圖上的“阿爾坦河”，亦即台飛黃河源區圖的“楚爾莫札陵水”。阿彌達到過的河源阿爾坦河即今喀喇渠，又多了一個可靠的証據。(iii) 清末民初的地圖上把黃河源繪成三支，“黃河源”注在中支，並注有“馬楚河”字樣，都是自此圖直接或間接抄出，這只要一比較鄒代鈞所繪諸圖就不難知道。傅樂煥先生認為清末民初的人就已經知道黃河正源約古宗列渠的說法，就不必再辯論了。

(6) 黃河在星宿海以西有三支上源，親自看到的人據現在所知，至少有三次記載，而且都是專門勘查，繪製有圖。第一次是康熙四十三年拉錫等探河源，第二次是康熙五十六年喇嘛楚兒沁藏布等測量河源地形，第三次是乾隆四十七年阿彌達探河源¹⁾，1907年台飛在河源勘測，又加以証實，他也看見這條大水從北岸來會，這個事實不容懷疑。好多中外地圖都是這麼繪的。直到1917年印度測量局印行的西藏及其鄰近諸國圖²⁾，也還是把黃河上源繪成三支。北面那一支黃河上源肯定是存在，將來一定會被勘查到的，我們建議把這三支上源分別叫做黃河南源、中源、北源，中源“約古宗列渠”和南源“喀喇渠”在歷史上都分別被肯定為黃河源。只有北源的源頭，好像無人到過，情形就不清楚了。

1) 東華全錄卷96，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己酉條：“說阿彌達探河事竣復命，據按定額繪圖具說呈覽”，其圖今亦未見，乾隆年間曾木刻過一種“黃河源圖”是根據他探查的材料，但用的是半繪畫方式。阿彌達的探河源結果，實際上並沒有正式載入輿圖，因為這時實測諸圖都早已完成了。

2) 圖名“Tibet and adjacent countries”

THE PROBLEM OF THE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Whang Sheng Chang

(*Institute of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present paper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1. Chapter One solves mainly two problems:

(A) "Yo Gu Tsung Lieh Ch'ü(river)" as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investigated in 1952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1717. The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which was drawn in "The Complete Atlas of the Imperial Territory" and described in Ch'i Shao Nan's "The Outlines of the Water Canals" was no other than the same mentioned above and that known by Mongolian terms as Soloma, or Altan Gol, was also the same as the one Albert Tafel investigated in 1707.

(B) "Ka La Ch'ü(river)" investigated in 1952 is a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congruent with the "Altan River" investigated by A-Mida (阿彌達) in 1782. This river lies near the main road leading to Tibet. Tracing several routes leading from Hsining to Tibet adopted in the Ch'ing Dynasty, we find out the "Ka La River Station". By studying the position of the station and comparing the maps compiled in the Ch'ing Dynasty, we are able to prove that this is the "Ka La Ch'ü" of the present time. The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investigated by A-Mida is somewhere around this place.

2. Why twice was the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investigated in 1717 and 1782 and why were two different sources known by the same name "Altan Gol"?

Chapter Two explains this question.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the Ch'ing Dynasty relat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ourc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re were three upper sources due west of Sing Su Hai, and all of them were known as "Gorban Soloma". "Gorban" in the Mongolian language means three. Therefore all the three were known by the same name "Soloma" and were the sources of the Yellow River. But the central "Soloma" also known as "Altan Gol" was clearly recorded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h'ing Dynasty. The report by Albert Tafel has confirmed this. This explains that these three "Soloma" may also be called "Altan Gol". Evidences showing that the Central "Soloma" (Yo Gu Tsung Lieh Ch'ü (river)) may be called Altan Gol and the South "Soloma" (Ka La Ch'ü) may also be called Altan Gol, have been found. The author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south Soloma may similarly be called Altan Gol. (In a Supplement to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nfirms that this river is definitely called "Altan Gol" and offers evidences found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two sources of documents and maps that people already recognized it as the "ancestral"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3. Chapter Three principally explains that there should be three upper sources for the Yellow River. The central one should be the "Yo Gu Tsung Lieh Ch'ü". The south source should be the "Ka La Ch'ü," which was amply discussed in the records of the Tang, the Yuan and the Ming Dynasties. The "Yo Gu Tsung Lieh Ch'ü"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g Dynasty. Besides these two sources, there ought to have been another source somewhere due north and it will, sooner or later, be found. All the three mentioned above were admitted to be the sources of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g Dynasty. In 1708, 1717 and 1782 when experts were despatched to investigate the sourc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se three sources were actually located. A. Tafel further confirmed this fact in 1907.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se three sources be named as the central, south and north sources respectively. It might be the fact that the "Yo Gu Tsung Lieh Ch'ü" is the main source. In this regard, further discussion is required.